

游移: 基兰·德赛笔下的印度人

黄怡婷

内容提要 “游移”是德赛代表作《继承失落的人》中现代印度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故事的背景空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小城，当地的尼泊尔人在回归过去与追随未来之间进退不得，错位游移。这映射出印度独立之后在平衡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的利益、平衡前帝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权重方面游移不定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比居进行着一次“家乡—美国—家乡”地理空间上的“游移”之旅，而少女赛伊则在一心向往的帝国文化与熟悉温暖的印度本土文化之间展开着心理空间的“游移”。这既是印度人在当下迷茫心态的反映，也折射出作者对整个印度社会在“游移”中走向融合的预期。

关键词 游移 到达 错位 融合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6.04.017

印裔女作家基兰德赛（Kiran Desai）的半自传性小说《继承失落的人》（*The Inheritance of Loss*）以博尔赫斯的诗《宁静的自得》为题记，“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①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诗中的“远方”与“到达”构成一对既对立又共存的具有强大张力的意象，寓示了一种“游移”的状态，而“不存到达希望”则表达了一种游移中的旷达心境。诗中的这几个关键词一直是印裔作家们的关注焦点。来自遥远特立尼达的印裔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常年游走各地，其写作内容涉及世界各大洲，不过其作品都鲜明地指向一个主题：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居民，该如何寻找抵达前殖民帝国文化的核心。坚持定居印度的作家罗伊（A. Roy）则恰好相反。她以印度本土为支点，主要关注后殖民时代中，在隐性的帝国殖民统治与印度本土民族力量崛起的碰

撞冲突间，普通印度人如何在社会的动荡变迁中以各种方式寻找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位置。与这两位作家不一样的是，德赛无论是其生活经历，还是其作品，都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归属目标。在印度度过少年时代之后，德赛随母出国定居。至小说出版的2006年，她已在美国生活了20年，却始终坚持持有印度护照而不是入籍美国。这期间，在印度和美国之间穿梭往返是她的生活常态。对于这种生活状态，德赛曾表示“我在任何地方都感到既舒服又不舒服。”^②她的这番生活感慨与小说的这一句题记不谋而合。“舒服”是因“不存到达希望”的超然而获得的“宁静的自得”，而“不舒服”则是在“远方”与“到达”之间游移时出现“错位”^③（dislocation）而引发的心理感受。《继承失落的人》可谓德赛所言的这种“舒服又不舒服”的感觉的诠释，整部小说中

的人物在“远方”与“到达”之间游移。不论是给人无限憧憬的前殖民帝国,还是让人留恋难忘的印度家乡,当它们是希望“到达”的目的地时,好像都有着无尽的诱惑力,令人孜孜以求,不辞辛劳跋涉而去。可是,当人们与它渐行渐近之后,却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对象地。由此,永远无法“到达”的“游移”,在德赛笔下,成为现代印度人的写照;而“不存到达希望”所具有的主动性与旷达态度则寄寓了作者的某种期待。

一、小说人物在背景空间中的游移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城卡林堡。作者是这样描述卡林堡的:“在这里,印度、不丹和锡金交界模糊……这一带的版图向来混乱。报纸似乎也不愿置评。”^④也就是说,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归属不确定的“游移”的背景空间。知名后殖民学者罗伯特·杨(R. J. C. Young)曾援引印度地图上印制的来自印度官方的一句话——“印度外围的边界既不正确也不真实”(这句话可谓小说背景空间“游移”性质的注脚),并借此发问:“除了边境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地构成了国家?”^⑤他特别指出,“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关注“国家作为一种压迫力量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并“从碎片的角度对后殖民或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思考”。^⑥而所谓“碎片”,就是指“那些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一国家的人或部分,他们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和外围”。^⑦在“游移”的空间中生活的人也必然带上某种“游移”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属于印度少数民族的尼泊尔人基恩、困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比居和出自富裕知识精英家庭的赛伊)无不具有这种“碎片”的身份特征,在社会的边缘和外围向核心“游移”。我们首先分析这个归属游移不定的小城中的主要居民印度尼泊尔人。

围绕领土争夺的国家角力使得卡林堡这个

小城始终弥漫着战争的紧张气氛,也导致世代生活在此的尼泊尔人如同那条被“雾霭”(8页)模糊了的边界一般,卑微得失去了存在感。由此,在小说开篇,作者便描述了这群现如今是印度籍的尼泊尔人正在发起一场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的暴乱,理由是他们“受够了在他们占多数的地方被当成少数族”(8页),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奋斗过的国家”,“被当作奴隶”(175页)。尼泊尔人在印度所从事的传统职业主要是苦力和士兵,在殖民时代也是如此。从小说中女主人公赛伊的男友、尼泊尔裔的穷大学生基恩所描述的家族史中可知,他们世代为英殖民政权征战,直至家族中最后一名叔伯辈男丁伤残退役,而他家也随之断绝了以从军来养家的生计并陷入赤贫之中。他们是殖民统治体系中处于最底层的被剥削者,从事着这一体系中最艰辛又最危险的职业以养家糊口,其命运往往以悲剧结尾。尼泊尔人在“游移”的背景空间中的不幸遭遇可谓底层印度人在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缩影。

然而,就是这样残酷的一段历史,在基恩口中反而成了可资炫耀的资本,原因在于这使得“他的家史也和外国有关”(157页)。这种勉力为之的炫耀既流露出对殖民统治时代的怀念之情,更反衬出他们当下生活的暗淡无光。在取得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政府都把资源向工业发展倾斜。然而,“一切大规模的工业化,都不得不以某种确定的城乡交换关系为基础;而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交换的天平永远要倾向于前者。这将导致乡村的失业与贫困;或同等的,对殖民地的剥削。”^⑧这就对乡村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正如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所言“对于新一代印度人来说,乡村越来越成为人口和统计上的数据……在众多愿景中,一个生机勃勃的乡村不在此列。”^⑨独立建国30年后,印度的尼泊尔人多数仍在乡间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和在殖民时代一样,没有自己的土地或产业,无

法积累财富，也不能提高族群的受教育程度。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照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之殖民时代更显严酷。甚至像基恩这样完成了大学学业的知识青年，受限于他少数民族的出身和贫寒的家境，依然难以在这个日渐走向现代而失去乡村依托的小镇中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更不用说绝大部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尼泊尔青少年，他们想要自力更生的愿望就更不可能实现了。由此可见，暴乱的发生是这一群体绝望情绪的总爆发。这实际上映射出印度独立之后在平衡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的利益、平衡前帝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权重方面的游移不定，这给整个国家带来困境。

基恩作为印度尼泊尔人中的知识青年，可谓这一族群的代言，其言语中所透露出的丰富信息，以及印度尼泊尔人发动暴乱的诉求，使得这场暴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渴望向殖民时代生活回归的意味。他们在殖民时代当兵是为了衣食无忧，于是使自己成为殖民统治的附庸；现在他们选择武力反抗，也仅仅是为了衣食有着落。如此，其独立建国的诉求显得更像是对殖民时代族群生存模式的一种复制，即向殖民时代这一目标的错位游移。

只不过，这种错位游移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南柯一梦”。暴动发生后，卡林堡陷入一片萧条。每晚宵禁，市场关闭，富人们被洗劫一空后也过上了穷日子，以尼泊尔人为主的穷人们除了造反之外和以前一样无所事事。显然，这样一种生产、生活全面停摆的社会运行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更不可能就此为尼泊尔人创造出一个有饭吃、有衣穿的社会新景象，尼泊尔人期待回归殖民时代生活的愿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就如同现今一部分印度人期待“到达”帝国文化核心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这就表明，在印度取得独立的后殖民时代，面对工业化的浪潮，印度的底层民众既无法向殖民统治的过去回归，也无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未来，他们始终无法摆脱难以自救的被

动局面。他们所身陷的这一进退不得的两难境地与卡林堡那条任凭时代更迭却模糊依旧的边界这一意象两相应和，似乎暗示了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民族国家与之前作为殖民地国家在对待发展民生这一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间不存在可从时间上划分清楚的“边界”。这也使得卡林堡这场试图走向“核心”的暴动充满了无法“到达”目的地的绝望和对社会整体的破坏欲望。

卡林堡与生活其中的尼泊尔人的境遇，在映射现当代印度与印度人的同时，成为整部小说的背景，映衬的是两位主人公比居和赛伊的“游移”之旅。

二、小说人物在地理空间上的游移

比居从小在印度农村长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也没有掌握什么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的专业技能。因为在当地几乎不可能找到什么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一成年，他的父亲厨子就耗尽积蓄把他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到纽约当了一个非法居留的黑工。

比居无法在国内谋生而不得不前往美国，这与在印度乡村社会延续了上千年的“贾吉曼尼制度”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消亡有着直接联系。“贾吉曼尼制度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低种姓依附于高种姓，前者世代为后者提供各种服务……依附种姓同高种姓结成一种固定的主子——奴仆关系。”^⑩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贾吉曼尼制度”下，每一个村落的村民按照各自的种姓、职业等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圈。低阶层的村民依靠给高种姓或富裕家庭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后者则视他们的服务为理所当然，同时也把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视作自己身为高等阶层的责任。同时，他们的生活同村落之外的社会环境变动的关系不大。然而，“商品经济就像一剂腐蚀剂，不断腐蚀着村落社会，把笼罩在传统贾吉曼尼制度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无

情地撕去,使其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①总体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在印度发展起来后,贾吉曼尼制度是“朝着一种较自由的现代雇佣关系方向变化”。^②这对于低种姓群体来说,“他们的独立性增强了”的同时,“他们生活也失去了保障和稳定。”^③返回到小说中,我们确实已见不到这样互利相依的阶层关系和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或者存在的至多只是这种传统制度的残余。厨子与赛伊的外祖父帕特尔之间大约还存在着这样的主仆人生契约,厨子也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但是当帕特尔法官提出要让比居来接替厨子的工作时,后者明确表示了拒绝(197页)。这表明在低阶人群眼中,原来的这种传统人生契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同时,工业化潮流使得人们不得不抛弃旧日的乡村生活,尽可能地融入现代工业文明中,以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源。然而,比居显然并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应对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术技能。他唯一能胜任的事就是简单的出卖劳动力。在这样基本没有选择的生活现实面前,他去美国出卖劳力,就能赚取同等前提下更多的收入,乃至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就成为比居一个“希望到达”的目标。

然而,比居是利用旅游签证在纽约非法居留的。这样一个不见天日的身份使得比居只能辗转于纽约的各式快餐店,从事最肮脏、最辛苦又最廉价的工作,承受老板们最苛刻同时还最挑剔的体力压榨,以至于比居只能自我放弃地认为“顶上是完美的第一世界,二十二级台阶之下是完美的第三世界。”(25页)比居话中的这“二十二级台阶”尤为引人注目。著名学者霍米·巴巴(H. K. Bhabha)曾借用“楼梯井”来描述一种“阈限空间”,它“位于指定身份的中间……是构成上层与下层、黑人与白人之间差异的连结组织……它所允许的暂时移动和通路,阻止了位于两端的任一身份进入最初的两极。这条位于确定身份之

148

间的间隙通路开启了一种文化混杂的可能性,而这种混杂可抛开一种假定的或强加的等级制度来包容差异。”^④由此可见,巴巴赋予“楼梯井”这一意象以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们互相连通的积极意义。对于从前殖民地国家前往帝国的人们而言,他们可通过攀爬“楼梯井”以改造自己的文化身份,达到融入当地社会的目的,进而突破前殖民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的话语主权,实现前殖民地人民能够自己发声的策略目标。然而,这样具有戏剧效果的逆转并没有在比居的生活中发生。他走在路上向路过的美国女孩们打招呼,“可她们几乎看都不看他一眼”(135页)。他希望快餐店的老板们帮助他申请绿卡,可这是所有老板们不可碰触的红线。因此,对于比居来说,这“二十二级台阶”就是结结实实的社会阶层与种族隔离,至少在他身上是绝无实现流通上升的可能。他的遭遇几乎构成了对霍米·巴巴“楼梯井”策略阐释的反讽,明确表明一个不具备现代工业社会职业技能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因此,比居实际上处于一个永远没有“到达”希望的困境之中。

极致的孤独感促使比居开始时常怀念在乡村与奶奶一同度过的童年时光。手磨面粉做的面饼、宁静得几乎静止的乡村时光,以及亲密而互相依赖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要素所体现出的实际上是封闭而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活的特点,这与全社会高度协同作业、同时强调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工业社会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比居向过去生活方式的“游移”,显示出其作为一个刚刚脱离了农业生活方式的农村青年,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却无法适应,难以找到一个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新身份。既然无法“到达”,比居选择了主动“离开”,他决定提前回国,放弃在同乡眼中“被奉为国王”(295页)、实为低级打工仔的生活。

然而,现在的家乡还能为他提供这样的归宿感吗?忙碌的加尔各答机场汇聚着从世界各

地回来的印度人，一切都显得匆忙、流动而嘈杂。这样的景象正符合加尔各答作为印度国际大都市的定位，使得一切都显得现代而未定，与传统乡村的缓慢节奏相去甚远，反而与遥远的纽约具有相似的现代元素。这一方面暗示了比居即使回到印度，仍要像在纽约那般谋生，一样挣着这个城市最低限度的薪水，一样忍受囿于社会最底层难以向上流通所带来的孤独与绝望。另一方面，从殖民时代延续而来的富人与穷人的二元对立、城市工业经济与乡村农耕经济的二元对立——它们始终存在，甚至不断加剧。因此，无论是现代化的加尔各答或纽约，还是曾经宁静、如今却陷于纷争的乡村，都把在后殖民全球化时代中不占有经济和知识资源的绝大多数印度穷人逼到了难以立足的人生困境中，留给他们的只有到城市中去发家致富这一渺茫希望。可真正到了城市中，人们或许又将如比居那般，怀念曾经的乡村生活，背弃原本追逐的城市生活，处在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游移”中。

在谈及二元经济对立时，霍米·巴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元经济不是真正的繁荣。”^⑮他提出“用少数派的眼光来衡量全球发展”，^⑯“将边缘化和全球化看作准殖民的。”^⑰那么“聚居于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劳工，还有身体上被隔离、心灵上遭到法律和惯例歧视的族群”就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而结论也昭然若揭“全球化始于本土。”^⑱具体说来，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乡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乡村，它不得不变化，它也需要变化，但这个变化了的乡村仍然需要给它的所有居民一个生存的空间，从而打破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之间的鲜明对立。尽管跌跌撞撞进入到城市生活中的比居并没有享受到霍米·巴巴所呼吁的这种“多元的平等”，但他在地理空间上的游移，在客观上，为打破城乡之间的鲜明对立、进而为两者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三、小说人物在心理空间上的游移

相较于比居的奔波与辛劳，17岁的少女赛伊的生活称得上悠闲舒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活得轻松自由。赛伊从小生长在修道院中，受传统英式教育，过典型英式生活。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上来说，显然英国是她的首选。然而，她却是一个地道的印度人，并且从未离开过印度。也就是说，对于赛伊而言，印度毋庸置疑才是生养了她的第一故乡，同时很可能也将是她生活一辈子的地方。不过，印度式的生活显然并不为赛伊所熟悉，甚至她还本能地加以排斥。比如，她和男友基恩一同吃饭，她用刀叉，而后者不假思索地用手抓饭，“这差异让他们有一丝尴尬”（156页）。由此，英国与印度，哪一方才是赛伊的目的地？赛伊在心理空间上的游移由此开始。

对于赛伊而言，英国文化，或更广义地说，因帝国殖民统治而得以在印度传播的西方文化，比之印度本土传统文化，为她营造出了更熟悉更亲近的生活环境。她所钟爱的圣诞晚会、游廊上的下午茶聚会等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赛伊所接受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事物都是通过养育者模拟的生活环境而习得，并非在真实的西方社会中成长而获得。那么，从这一角度而言，赛伊所亲近的西方文化更像是另一位著名印裔流散作家拉什迪（S. Rushdie）笔下所描绘的观者不断接近的“影院幕布”。^⑲拉什迪用这一比喻来说明作家写作中的感觉认知问题，指出人的认知过程如同一个不断向着幕布前移的观者。随着观者与幕布的距离不断缩短，“‘幻觉本身成为现实’。”^⑳然而，跟随这一空间推移而来的时间上当下的靠近，则使这种认知“非常刻意地失去深刻洞见，变得‘片面’起来”。^㉑赛伊从未到过欧美帝国，却追求书本上塑造的、身边人所营造出的各个年代混乱的帝国文化，这与拉什迪的这一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她犹如坐在影院中观影那般，

看似对她所关注的帝国文化有着越来越丰富的了解,然而一切终是“幻觉”。当她的鼻子与自己所倾慕的帝国文化那张“幕布”相触的时候,帝国就会化成现实,而她或许要面对自己对于帝国极为“片面”的认识。如果赛伊去往帝国生活,那么她需要更精确地模仿帝国原生居住者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细节等,以求得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帝国社会的核心文化中去。然而,再接近的模仿毕竟还是模仿。正如霍米·巴巴所言“殖民的模仿其目的在于一个改良的、可辨识的他者,即一个不同的主体,它几乎相同,却又略有不同。”^②也就是说,赛伊作为一个印度人,永远也不可能由内到外地完全把自己更改成一个前殖民帝国的原生居民,她只能是一个几乎与帝国的原住民相似、却仍有所差异的前殖民地移民。从这一角度上说,帝国文化之于赛伊,更多地充当了好似拉什迪所谓的“想象中的家园”^③这样的角色。

更进一步参考她祖辈的帝国生活经历,那么她这一“想象中的家园”与现实中的帝国相比则更显虚幻。赛伊的外祖父是坚定的亲英分子,他在生活中始终坚持自己在剑桥留学时学到的诸多英式生活作派,并极为排斥印式生活方式。这表明他已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出身的印度本土文化,而全心追随英帝国殖民统治文化则是他维持自信的唯一途径。然而他最终成了“每个人都厌憎的对象,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131页),以至于当他倚靠在躺椅上时,“向赛伊精确展示了他死去的样子”(2页)。这一细节意味着前殖民地人员主动拒斥本土文化并追随帝国殖民统治文化的行径,正如飞蛾扑火,最终失去的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肯定。从中可以看到,对前殖民帝国文化的孜孜追求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人本身发生异化,失去生命活力,以至于永远不能到达帝国文化的核心,也不可能成为帝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成员。从这一角度来说,一心渴望离开印度、前

往帝国的赛伊很可能重蹈祖辈的命运,在追逐帝国文化的路上成为永远没有“到达”希望的“游移”者。

从小浸淫的帝国文化不能真正接纳赛伊,那么让她回归印度本土传统文化?这可行吗?比之她的外祖父,赛伊对印度本土文化少了一种主动的拒斥,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她的外祖父极度厌恶雨季(120页),她却最爱潮湿的雨季,觉得在这个季节“平静又快乐”(117页)。显然,对绝大多数印度人而言,雨季比旱季可爱得多。一切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都需要围绕降雨才能展开,这是真正印度乡村生活的核心。由此可见,赛伊能够与印度的传统乡村生活同步,欣赏印度式自然景观的美,从而确实与印度本土文化共鸣。不仅如此,她还与身边没有受到多少帝国殖民文化“恩惠”的印度本土低阶人群有着深厚的情感交流。相比于严肃冷淡的外祖父,认不得几个字却极为宠爱赛伊的厨子俨然承担起了照料她的长辈角色,以至于赛伊竟嫉妒起厨子与他的儿子比居之间深挚的父子情来。不仅是亲情,赛伊的爱情同样属于穷大学生基恩。在热恋中,他们以“馍馍”(156页)相称。以这种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食物作为昵称,凸显了赛伊对这段印度乡村爱情的热切渴望。根据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第三层次“归属和爱的需要”中,他提到人都“渴望同人们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④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渴望拥有“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同时还有“要结群、加入集体、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⑤如果说赛伊所向往的帝国文化主要满足的是她对社会“归属感”的期待,那么她实际生活着的这个印度小城给予她的则是更个体化的“爱”。从这一角度来说,印度之于她的精神归宿,与帝国同等重要。可是,她的西式家庭出身注定了她不可能成为,也不可能被接纳为一个地道的印度人。小说中,当社会矛盾

激化时，她被视同其他一些真正的旅印欧洲移民，划归穷人的对立面，同样要承受来自印度底层民众的仇视。男友基恩对她家情况的出卖以及对她爱情的背叛便暗示了印度本土文化对她的西式家庭出身的客观排斥。这一切都意味着赛伊同样也无法“到达”本土文化的核心。

赛伊所处的这种文化归属上的两难境地和游移状态，恰如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in-between space）。霍米·巴巴以“第三空间”来表述“分裂的主体”中的一种“矛盾的、模糊的空间”，^②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而是之外的某物”，是“文化意义和认同总是包含其他意义和认同痕迹的空间”。^③赛伊的生存环境恰好便是这样一种文化意义和认同混杂的空间。身处这样的两相纠结之中，求得一种泾渭分明的生活状态或结果并不重要，也难以得到，最重要是需要明白，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哪一些文化产生了作用，它们又是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帝国殖民文化满足了赛伊向外求索的欲望，投射的是她试图跟上世界发展的迫切愿望。出身于亲英高等门第的赛伊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印度兼具知识与财富的精英阶层在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印度这个社会发展的期待。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深厚的传统文化更是浸润在每一个印度人心底的文化之根。换句话说，只有接纳了这种文化并自觉传承，作为一个印度人才能真正活得踏实。赛伊在文化归属上的两难境地和游移状态尽管充满了迷茫，但也正是这种游移，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 游移中的期待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还为这部小说设置了一个双向选择的结尾。赛伊虽然难以割舍与基恩的恋情，但她还是“感到一线力量与决心的微光”，于是下定决心“她必须离开”

(356页)。而比居在被暴乱的尼泊尔人洗劫一空后，虽然不断后悔自己居然会选择回国，但见到父亲厨子的那一刻，他们“雀跃着扑向对方”(357页)。一方面是离开，另一方面又是回归，这一双向选择的结尾，两者叠加，在开启了新一轮“游移”循环的同时，也寓意着“游移”本身或许也能构成某种完整，在“不存到达希望”的游移中获得宁静与自在。这正如基恩在物理课上反复对赛伊的发问“两个物体……如果同时被扔下比萨斜塔，它们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速度落到地面？”(179页)基恩关注的重心在于物体的落地，而赛伊关注的则是物体的运动过程及其体现出的状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断推移更替，纠结于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文明与随着国家独立而来的本土复兴之间的印度人，无论是离开还是回归，或者永远徘徊在东西方之间，会在这种不停歇的“游移”中看到自己越来越清晰的未来。

《失落》以“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为题记而开启了“游移”之旅，而干城章嘉雪峰顶的金光又暗示了一个新的印度或许就从这一片躁动不安又混乱不堪的“游移”之中悄然诞生。这或许也是作者在“游移”中的期待吧。

注释：

- ① 基兰·德赛 《失落》，“题记”，韩丽枫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 ② Laura Barton, “A Passage From India”, *The Guardian*, 12 October 2006,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6/oct/12/bookerprize2006.thebookerprize>.
- ③ Donna Rifkind, “Orphans of the Empir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30/AR2006033001554.html>.
- ④ Kiran Desai,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 p. 8. (后文引用，随文标注页码。)
- ⑤ 罗伯特·J. C. 扬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61页。
- ⑥ 罗伯特·J. C. 扬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65页。

- ⑦ 罗伯特·J. C. 扬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65页。
- ⑧ 帕尔塔·查特吉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115页。
- ⑨ 阿希斯·南迪 《乡村想象的弱化》，卢隽婷译，载《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41页。
- ⑩ 尚会鹏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49-250页。
- ⑪ 尚会鹏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52-253页。
- ⑫ 尚会鹏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53页。
- ⑬ 尚会鹏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55页。
- ⑭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2004), p. 5.
- ⑮ 霍米·巴巴 《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钟添雅译，载《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0页。
- ⑯ 霍米·巴巴 《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11页。
- ⑰ 霍米·巴巴 《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16页。
- ⑱ 霍米·巴巴 《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20页。
- ⑲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Vintage Books, 2010), p. 13.
- ⑳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p. 13.
- ㉑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p. 13.
- ㉒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122.
- ㉓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p. 9.
- ㉔ 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2页。
- ㉕ 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22页。
- ㉖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83页。
- ㉗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81页。
- ㉘ Peter Merriman, *Mobility, Space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17.
- ㉙ 杜赞奇 《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王宪明译，载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4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丽明

how a bio-regional place (native place) shapes polyvalent identities in a historically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how the boundary that crisscrosses the passages of life is redrawn through narrative re-circumscription and optical revision. Secondly , the essay calls this trope of internalizing “border-crossing” into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diaspora and critically problematizes Williams’ s identity politics as schizophrenic split from the British post-colonial empire.

Racial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Caryl Phillips’ s *Foreigners*

XU Bin

In *Foreigners* , a collection of biographical stories , Caryl Phillips raises and answers a racial ethical question: why are Turpin as a British native son and Oluwale as an immigrant from former British colony Lagos Nigeria regarded as inferior “foreigners” who are racial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persecuted? Through a literary rewriting of the miserable fates of Turpin and Oluwale , Phillips condemns the narrow minded racial tribal ideology in the postwar British society and awakens the conscience of the British people , hoping that Britain will one day become a real home for its colored citizens represented by the Black British.

The Blacks’ Quilt and Indians’ Hoop: The Hybrid Narrative in *Meridian*

WANG Xiujie

As one of the foremost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 Alice Walker recognizes her African American and American Indian ancestries in her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 and reflects her complex national cultures in many of her published works , especially in her fiction , which enhances the trait of hybridity for the text. In her second novel *Meridian* , Walker demonstrates the living and growing fragments of African Americans with “blackness-marking” quilts and combines them with American Indians’ ideas of hoops , establishing Walker’s “Indianness” in writing her black texts.

Wavering: Kiran Desai’ s Indians

HUANG Yiting

In Kiran Desai’ s masterpiece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 “wavering”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life of many Indians nowadays. The story is set in a town with a vague boundary , and the Nepalese there are caught between returning to the past and pursuing the future with no definite purpose. The status of both the town and the people has expose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ocial and ethnic groups , as well as the imperial and the native cultures. While reflecting upon the confusion of the Indians , the author discloses his expectations for a gradual social fusion in the country.